

柘枝舞起源三说平议

郭 丽

内容提要：柘枝舞是唐宋时期流行的乐舞，其起源有石国、拓跋和南诏三说。石国说虽然可信但论证有待充实；拓跋说出现原因尚需申论；南诏说看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

关键词：柘枝舞 起源 石国说 拓跋说 南诏说

柘枝舞是唐代著名舞蹈，与胡旋舞、胡腾舞并称“三大舞”，唐宋诗文多有歌咏，《柘枝词》《屈柘词》为柘枝舞歌辞。柘枝舞的起源，唐宋人有石国、南诏、拓跋三说。上世纪30年代向达作《〈柘枝舞〉小考》^①，主石国说；40年代杨宪益作《〈柘枝舞〉的来源》^②，主南诏说；世纪之交韩国学者沈淑庆作《关于“莲花台舞”历史演变的研究》^③，主拓跋说。上世纪80年代任半塘作《唐声诗》，以为拓跋说较浅无需讨论，石国说、南诏说虽各有所据但均不健全，所憾他并没有进一步论述。^④石国说被后来学者普遍采纳。^⑤笔者重新考察了三家说法，认为石国说虽然可信但论证仍有待充实，拓跋说出现原因尚可进一步申论，南诏说看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

石国说补证

向达《〈柘枝舞〉小考》认为柘枝舞出自石国。他据《新唐书·西域传》中“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的记载和唐人薛能《柘枝词三首》中“震鼓伐西羌”、“悬军征柘羯”两句诗认为柘支、柘折、赭时、柘枝及柘羯，均为波斯语 Chaj 之译音，皆指西域之石国。^⑥

① 向达：《〈柘枝舞〉小考》，原载《清华周刊》第37卷第12期，后收入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② 杨宪益：《〈柘枝舞〉的来源》，《译余偶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③ 沈淑庆：《关于“莲花台舞”历史演变的研究》，《舞蹈》2000年第4期。

④ 任半塘：《唐声诗》（下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⑤ 参见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以及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⑥ 向达：《〈柘枝舞〉小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98页。

这一看法极有见地,但他遗漏了一条重要证据。这一证据不仅可使石国说论证更加圆满,而且有利于弄清拓跋说的来源。此外,向达以为柘枝舞是天宝九载高仙芝平石国时带回的观点也有商榷空间。

向达遗漏之证据为唐人卢肇《湖南观双〈柘枝舞〉赋》中的记载,赋云:“古也郅支之伎,今也柘枝之名。”^①卢肇明确指出柘枝舞出自古郅支。这样,弄清郅支与石国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支撑石国说的关键一环。

郅支是西汉时北匈奴五单于之一,《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云:

先是,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汉两受之。……(郅支单于)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汉兵四面推鹵橦,并入土城中。……单于被创死。……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②

郅支附汉而又背汉,赴康居而又杀康居王,被汉将陈汤、甘延寿等率兵诛灭,其俘虏一部分被赋予康居国。这部分人在康居国生存下来,传衍至北魏,称者舌国。《魏书·西域传》载:“者舌国,故康居国。”^③有学者指出,“者舌”是“石”的音译,至隋唐时称石国。^④

除音译外,其他史料也可证明者舌国与石国之关系。《隋书·西域传》载:“石国居于药杀水。都城方十余里,其王姓石名涅。”^⑤《新唐书·西域传》亦载:“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罽匿城地。”^⑥这些记载可与《汉书·西域传》所载相互印证:“康居有小王五:……三曰罽匿王,治罽匿城。”^⑦可以看出,《新唐书·西域传》所载石国治所柘折城与《汉书·西域传》所载汉康居小王罽匿王治所相同,隋唐石国和北魏者舌国同为汉代康居国之后。石国与者舌国同源,恰可印证北魏者舌国就是隋唐石国的结论。而以上石国从汉至唐的演变过程,也正好与卢肇“古也郅支之伎,今也柘枝之名”的说法

① 董诰纂修《全唐文》卷七六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994页。

② 班固:《汉书》卷七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08~3015页。

③ 魏收:《魏书》卷一〇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4页。

④ 参见余太山《大宛和康居综考》,《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

⑤ 魏征:《隋书》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0页。

⑥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6页。

⑦ 班固:《汉书》卷九六,第3894页。

相吻合。

石国在流变过程中产生过多种称谓,汉代叫郅支,北魏叫者舌,隋唐称石国,又称柘支、柘折、赭时、柘羯。多种称谓长期混用,增加了探索柘枝舞起源问题的复杂性。经季羨林等学者考证,已基本厘清各种名称之来历:“者舌”、“柘支”、“柘折”、“赭时”、“柘羯”等均为音译,粟特语作 C(v)'c,波斯语作 Chach 或 Jaj,阿拉伯语作 Shash,突厥语作 Tash。“石”为义译。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塔什干意即石城。^①柘枝舞是以国命名的乐舞。

柘枝舞何时传入中原,以何种方式传入,向达据薛能《柘枝词》推测是天宝九载高仙芝平石国时带回。^②这一推测虽有其道理,但并无直接证据,更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

首先,柘枝舞在天宝九载之前就可能已经传入中原。北周隋唐时西域有康国,是汉代康居国之后。《隋书·西域传》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③《新唐书·西域传》载:“康者,……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④《新唐书·西域传》亦载:“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⑤可见,康国为汉康居国之后,枝庶分为九国,即昭武九姓国,皆以康国为宗主国,其中包含石国。康国乐在北周时通过突厥传入中原。《旧唐书·音乐志》载:“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⑥因北周武帝与突厥联姻,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等西域乐舞同时传入中原,康国乐中可能含有石国乐。这即是说,北周时柘枝舞就可能已经传入中原。

其次,唐人沈亚之《柘枝舞赋》云:“昔神祖之克戎,宾杂舞以混会。柘枝信其多妍兮,命佳人以继态。”^⑦意为柘枝舞是“神祖”“克戎”传入。“神祖”指开国之祖,唐代开国之祖李渊无“克戎”之实。既有“神祖”之名又有“克戎”之实者为唐太宗。“戎”一般指西域胡人,唐太宗克西戎,应该指攻克西突厥。石国隶属西突厥,柘枝舞很有可能是唐太宗讨伐西突厥时传入中原的。

再次,除联姻和武力获取外,还可能通过其他方式传入。进贡就是方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就记有康国开元初年向唐朝进贡胡旋女子事:“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玛瑙瓶、鸵

① 季羨林:《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3页;杜环:《经行记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25页。

② 向达:《〈柘枝舞〉小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100页。

③ 魏征:《隋书》卷八三,第1848页。

④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一,第6243页。

⑤ 同上,第6244~6247页。

⑥ 刘昫:《旧唐书》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9页。

⑦ 董诰纂修《全唐文》卷七三四,第7572页。

鸟卵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①此外,使者带回也是一种方式。《旧唐书·外戚传》载:“延秀,承嗣第二子也。则天时,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请和亲,制延秀与阎知微俱往突厥,……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②武延秀出使突厥时学会了胡旋舞,并将其带回唐土,这说明使者带回是胡舞传入的方式之一。此外,边地艺人将胡舞带入中原也有可能。李端《胡腾儿》就描写了一个凉州胡人跳《胡腾舞》的情形:“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③既然胡旋舞和胡腾舞都能以上述方式传入中原,同理,柘枝舞也有可能通过进贡、使者、边地艺人等多种途径传入。

唐人崔令钦《教坊记》曰:“凡棚车上击鼓非《柘枝》,则《阿辽破》也。”^④宋人陈旸《乐书》云:“唐明皇时那胡柘枝,众人莫不称善。”^⑤可知柘枝舞于玄宗年间已在宫廷表演。至于何时传入唐朝,以何种方式传入,存在多种可能性。高仙芝天宝九载平石国时带回只是其中一种可能。

拓跋说申论

柘枝舞源于拓跋,始自唐人赵璘《因话录》:“柘枝舞之本出拓跋氏之国,流传误为柘枝也,以其字相近耳。”^⑥宋人曾慥《类说》云:“柘枝舞,本后魏拓拔氏之戏,后人鄙之,易拓以柘,易拔以枝。”^⑦宋人温革《琐碎录》亦云:“柘枝舞,本北魏拓拔之名,易拓为柘,易拔为枝。”^⑧韩国学者沈淑庆认可拓跋说却并未给出有力佐证,向达认定此说“固属猜测之词”,任半塘以为“其说较浅”,不值一驳。但笔者认为拓跋说的出现并非猜测浅薄之词,而是事出有因。

前已言及,石国在流变过程中产生过多种称谓。其中“柘羯”一名,唐代有时便称作“拓拔”。吴兢《贞观政要》载: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唯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⑨

①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一,第6244页。

② 刘昫:《旧唐书》卷一八三,第1069页。

③ 彭定求编《全唐诗》卷二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38页。

④ 任半塘:《教坊记笺订》,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页。

⑤ 陈旸:《乐书》卷一八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29页。

⑥ 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卷九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9917页。

⑦ 曾慥编《类说》卷四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3册,第599页。

⑧ 陶宗仪编《说郛》卷二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19页。

⑨ 吴兢:《贞观政要》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5页。

杜佑《通典》亦载：

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柘羯不至，诏使招慰之。^①

两条史料均记东突厥颉利可汗失败后西域小国首领降唐事。其中未降唐者，《贞观政要》称“拓拔”，《通典》称“柘羯”。《贞观政要》取材《贞观实录》^②，所记不致有误。而杜佑“为学冠冕六籍，衣裳群史，履屨百氏”^③，《通典》所记亦不致有误。出现这种情况最大可能是“拓拔”与“柘羯”为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

这两个称谓的出现，当与石国伴随突厥兴衰东迁有关。陈寅恪等学者认为，柘羯在唐初即属于西突厥，东突厥败亡后有少数柘羯东迁。至高宗、则天、玄宗时期，东突厥又全面复兴，向南对唐朝，向西对西突厥，向北对铁勒诸部，向东对契丹、奚拓展。^④在这反复迁徙过程中，柘羯可能正好进入位于东北部的鲜卑拓跋故地，与拓跋部落融合，因此才会出现吴兢、杜佑将“柘羯”“拓跋”混用的情形。而柘羯人在迁徙过程中，将柘枝舞带入鲜卑拓跋部落，于是出现了《因话录》和《琐碎录》中柘枝舞源自拓跋国之说。向达以该说为猜测之词而未做深究，任半塘以该说较浅而不作讨论，实为千虑一失。

此外，《玉堂闲话》中曾记载“朝士使朔方”一事，其中确实出现了名为“拓拔”的舞蹈：

使臣仰观《拓拔》，又斜盼《胡腾》，遂敛衽恭□□位视有若惭□□之貌。逡巡舞罢，趋而前谢曰：“已蒙相公排置宴筵，百戏娱乐，更不令烦贤郎□□歌舞颇□□□？”再三辞谢。盖见《拓拔》中有与《胡腾》鼻相类，乃呼作贤郎，以此轻薄之。^⑤

这条史料所载为朝使至朔方，朔方守将安排百戏歌舞招待的欢宴场景。在宴会歌舞中，就有拓拔舞和胡腾舞。其中的拓拔舞很可能就是柘枝舞。可见，称柘枝舞出自拓跋确有事实

① 杜佑：《通典》卷一九七，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5413 页。

② 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第 131 页。

③ 符载：《淮南节度使瀘陵公杜佑写真赞并序》，《全唐文》卷六九〇，第 7078 页。

④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45 页；李方：《后东突厥汗国复兴》，《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 9 期。

⑤ 李昉编《太平广记》卷二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 2085 页。

依据,只是今人在探究其来源时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南诏说证伪

南诏说出自南蛮说,最早由宋人郭茂倩提出。《乐府诗集》卷五十六《柘枝词》解题云:“柘枝,本柘枝舞也,其后字讹为柘枝。……沈亚之赋云:‘昔神祖之克戎,宾杂舞以混会。柘枝信其多妍,命佳人以继态。’然则似是戎夷之舞。按今舞人衣冠类蛮服,疑出南蛮诸国也。”^①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五亦云:“柘枝舞起于南蛮诸国,而盛于李唐。”^②今人杨宪益沿着郭茂倩的思路,从舞者服饰入手,提出十条证据证明柘枝舞源于南诏。^③这十条证据可以归结为四点:其一,柘树是南诏特产,柘枝舞者执柘而舞,故该舞为出自云南大理南诏之舞曲;其二,据服饰颜色、款式、所系腰带、孔雀罗衫名称、帽子形制认为该舞出自南诏;其三,伴奏乐器蛮鼙和道具莲花有南方暗示;其四,骠国乐舞姿与柘枝舞相似,故柘枝舞出自南诏。这四点证据看似确凿,实则都不能成立。

第一,柘树是南诏特产和舞者执柘枝而舞的说法不能成立。杨宪益据唐人樊绰《蛮书》中“蛮地无桑,悉养柘蚕,绕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竿干数丈”^④的记载认为柘树为南诏特产。尽管云南多种柘树确为事实,然而唐人文献中亦多见他地种植此物。如陆长源《唐东阳令戴公去思颂》、梁肃《过旧园赋序》、元稹《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孙樵《兴元新路记》分别记载唐代东阳(今浙江东阳市)、新安(今河南新安县)、剑南(今四川)、郾(今陕西眉县)等地种植桑柘。再者,《中国植物图志》载柘树“产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各省区(北达陕西、河北)”^⑤。唐代原始文献记载和现代植物学研究均表明,柘树并非南诏特产。杨宪益又据清人李调元《雨村曲话》认为柘枝舞者是执柘而舞。^⑥其实,在《雨村曲话》之前,清人毛奇龄《西河词话》卷二“词曲转变”亦有类似表述:“自唐人作《柘枝词》,《莲花铉歌》,则舞者所执,与歌者所措词,

①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五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30页。

② 何文煊编《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05页。

③ 任半塘将杨宪益的证据归结为九条:(一)用蛮鼙;(二)穿孔雀罗衫;(三)服红紫二色,适为南诏人所贵;(四)系金银镂花锦带;(五)戴卷檐帽;(六)穿窄袖罗衫;(七)舞中所用莲花,乃云南之木莲;(八)配金铃,缅甸人辟邪亦用金铃;(九)对舞姿与骠国乐相似。见任半塘《唐声诗》(下编),第177页。在杨宪益提供的证据中,任半塘漏掉了一条,即杨宪益以柘树是南诏特产、柘枝舞者执柘而舞认为该舞是出自云南大理的南诏舞曲。

④ 杨宪益引文断句有误,应为:“蛮地无桑,悉养柘蚕绕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竿干数丈。”见向达《蛮书校注》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3页。

⑤ 张秀实、吴征镒:《中国植物志》册一,卷二十三,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⑥ 杨宪益所引李调元《雨村曲话》原文为:“古人歌者舞者,各自为一,两不照应,至唐人《柘枝词》、《莲花铉歌》,则舞者所执与歌人所歌之词稍有相应矣。”见杨宪益:《〈柘枝舞〉的来源》,《译余偶拾》,第10页。

稍稍相应,然无事实也。”^①其中“然无事实也”一句至为关键,这透露出的讯息即是,柘枝舞实际表演中并非执柘而舞。

第二,服饰与南诏服饰相似也不能证明柘枝舞出自南诏。杨宪益据《蛮书》中南诏人贵绯紫两色的记载和唐人张祜、白居易咏柘枝舞诗中舞人服饰为红紫二色的描写,认为相同的服色正表明其渊源关系。实际上,衣贵绯紫不单是南诏人之好尚,实为唐人之普遍好尚。在唐代,皇室子孙着绯紫,高级官员也服绯紫,流风所及,百姓也经常衣绯着紫。舞者衣绯紫更是常见于文献记载。《通典》载:“贞观中,……庆善乐,舞四人,紫绫袍,大袖,丝布葱,假髻;破阵乐,舞四人,绯绫袍,锦衿褙,绯绫葱;承天乐,舞四人,紫袍,进德冠,并金铜带。”^②庆善、破阵、承天三乐舞者或衣紫、或衣绯的记载恰恰说明不能因柘枝舞者着红紫就认定其源出南诏。杨宪益还认为柘枝舞者系金银镂花锦带,与《蛮书》所载南诏人系金佉带相同。但从上引《通典》记载可以看出,承天乐舞者也系金铜腰带。杨宪益还认为,柘枝舞者窄袖舞衣与南诏人服饰特点一致。其实,衣袖窄小为胡服之典型特色。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载:“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袪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矣。”^③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亦有“细氍胡服双袖小”句。柘枝舞者穿窄袖舞衣正说明该舞出自西域。杨宪益又据张祜《感王将军柘枝妓殁》中“鸳鸯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两句诗认为孔雀罗衫含有南方暗示,这也是一种误解。《新唐书·地理志》载:“镇州常山郡,大都督府。本恒州恒山郡,……元和十五年避穆宗名更。土贡:孔雀罗、瓜子罗、春罗、梨。”^④可见孔雀罗是恒州(今河北正定)特产,故而当地以此作为进献朝廷的贡品。又,北宋诗人沈辽《龟兹舞》诗云:“玉颜二女高髻花,孔雀罗衫金画缕。”^⑤龟兹舞出自西域为学界所公认,若以柘枝舞者身着孔雀罗衫而断定其源于南诏,那么能否因龟兹舞者身着孔雀罗衫也称龟兹舞源于南诏呢?杨宪益还据唐人张祜《观杨瑗柘枝》诗中“卷檐虚帽交带垂”句及清人倪蜕《滇小记》中大理人戴钺形帽的记载,认为卷檐虚帽就是钺形帽。综合唐宋以来史料记载可知,柘枝舞者所戴帽子具有如下特征:卷檐、有飘带、有金铃或珠子一类饰物、体长而尖、靴型、有绣花。这样的形制与钺形帽绝非一物。

第三,称伴奏乐器蛮鼙和莲花道具有南诏风味也不可靠。张祜《观杨瑗柘枝》诗中有“促叠蛮鼙引柘枝”句,杨宪益据此认为“蛮鼙”本身就在暗示南方。对此有学者早已指出,“鼙”指

①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82页。

② 杜佑:《通典》卷一四六,第3721页。

③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7页。

④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九,第1014页。

⑤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卷七一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160页。

鼉皮鼓面的鼓, 鼉表明其西域渊源。^①杨宪益又据《南中杂记》所载云南木莲花和《乐苑》所载柘枝舞用二女童“于莲花中藏”两条史料, 认为柘枝舞中莲花道具与云南木莲有关。此说亦不确, 莲花广泛生于南北各省, 并非云南独有。此外, 莲花与佛教关系至为密切。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被认定是柘枝舞表演场景的盛唐第 217 窟、晚唐第 173 窟、宋代第 400 窟中都有莲花出现。^②因此, 与其说柘枝舞中莲花道具含有云南地域暗示, 倒不如说这是佛教对唐宋乐舞影响的体现。

第四, 以骠国乐中相对赴节之状与柘枝舞相似为据认为柘枝舞来自南诏也不可靠。杨宪益所据为《文献通考》: “骠国乐每为曲, 皆齐声唱, 各以两齐敛为赴节之状, 一低一仰, 未尝不相对, 有类中国柘枝舞焉。”^③以舞姿相似来判定柘枝舞起源的做法过于简单。骠国乐舞者二至十人不等, 《新唐书·骠国传》载: “初奏乐, 有赞者一人先导乐意, 其舞容随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④唐代柘枝舞者多为单人舞和双人对舞, 直至五代才有二人以上队舞。因此, 只能说骠国乐以二至十名舞者两两相对为赴节之状, 与柘枝舞之双人舞相似, 但不能据此断定二者同源。此外, 骠国乐至中唐贞元年间才传入中原。《唐会要》载: “骠国乐, 贞元十八年正月, 骠国王来献。”^⑤而柘枝舞早于开元天宝年间就已风靡唐土。更为重要的是, 开元年间玄宗曾赐胡乐和龟兹乐与南诏, 《蛮书》载: “牟寻指之曰, 先人归蕃来国, 开元皇帝赐胡部及龟兹音声各两部。”^⑥因此, 不仅不应以骠国乐舞姿相似于柘枝舞来推断柘枝舞的来源, 反倒可以说骠国乐中相对赴节之状的舞姿可能是受包含柘枝舞在内的胡乐影响的结果。

综上所述, 向达主张柘枝舞源于西域石国的说法虽然可信, 但论证不够充分, 其传入时间和方式有待进一步考证; 沈淑庆认为柘枝舞出自拓跋虽非言之无据, 只是在探究其来源时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杨宪益力主柘枝舞出自南诏看似有理, 实则并不可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唐乐府学典籍研究”(项目编号: 14CZW042) 阶段性成果。

(郭丽,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吴刚】

① 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 第 7 页。

② 谢生保:《敦煌壁画中的唐代胡风之一——胡乐胡舞》,《社科纵横》1994 年第 4 期。

③ 《文献通考》这段记载中“各以两齐敛为赴节之状”一句殊为难解, 所幸《唐会要》也有记载: “各以两手十指齐开齐敛, 为赴节之状。”仔细比对可以看出, 《文献通考》所记有阙文, 漏掉“手十指”三字, 《唐会要》所载正好补足其阙。见王溥《唐会要》卷三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年, 第 620 页。

④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 第 6314 页。

⑤ 王溥:《唐会要》卷三三, 第 620 页。

⑥ 向达:《蛮书校注》卷十, 第 252 页。